

# 房山境内的几座古桥和古井

顾梦红

## 大安山村的两座桥

在房山区西北深山中的大安山村，有两座古桥，经历了百年风雨，今天，仍默默地拱卫在河床之上，向过往的行人述说着曾经的风云变幻，岁月沧桑。

重善桥位于大安山村北的大北河之上，光绪丙申孟冬建。桥南北向，为一单孔拱桥，桥长 16.5 米，宽 4 米，桥身完全用山石砌成，拱宽 7.4 米，高 5.6 米。整体保护比较完好，目前已经无人使用。

桥北山坡上立有《重善修桥碑记》石碑一通，以青石制作，呈长方形，碑高 1 米、宽 0.53 米、厚 0.12 米，无首无座。碑身字迹略有模糊，整体保存较好。碑文记载：“房山西北大安山龙头沟下游光绪戊子河决成灾，涉者多溺，玉堂日击焉。与都中朱大人嵩山...商请建桥，桥北买地长十五丈宽二丈。丙申夏，邀里人宋喜旺、张国富等，捐助松银二百金，鸠工庇材，...创修大北河桥一座，里人来往便之...名曰重善桥...”。落款为“光绪丙申孟冬王玉堂记，冬月于鸿远书”。

根据碑文人们可以知道，当年修桥是因为大石河源头之一的大北河经常暴雨成灾，光绪戊子年为光绪十四年，即公元 1888 年。房山区志记载，是年暴雨数日，大石河中游漫水河处洪峰流量达 5040 立方米秒，河北镇一村庄数百人溺毙。大安山村也有多人伤亡。丙申年为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 1896 年）。洪灾八年后，村民王玉堂与地方官朱嵩山邀请村民宋喜旺、张国富等人商议建桥。于是买地、捐款。从夏天到孟冬，修桥大约进行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竣工后，村民往来方便。这是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为了弘扬这种精神，所以，该桥命名“重善桥”。

护村桥位于大安山村南的河流之上。南北向，灰石砌成，长 15 米，宽 5 米。桥身为单孔，拱宽 7 米。两侧拱上镶一石刻，楷书三字：卫村河；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保存较完好。

今天，有一些问题令人们疑惑不解。一是这两座桥同是修建于 1896 年，为什么桥南无碑，桥北有碑？二是因为“七月十五定旱涝”，民间修桥一般是在秋天，不可能在春天和冬天。所以两桥修建几乎是同一季节，这两座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三是假定南桥先修，为什么桥北的碑文中丝毫没有透露出桥南修桥的信息及南桥灾害情况？假定北桥先修，南桥“卫村河”三个字透露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立碑？

时过境迁，修桥人已经作古，百年之后的这些疑问，只能留给有心人去考

证研究了。

## 韩村河重修石桥碑刻

韩村河公园里绿树成荫，碧波荡漾。大理石精雕细刻的水光桥、生辉桥、硕果桥横跨南北，双人飞天、碰碰车、跳跳床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在水光桥南侧，古老的韩村河修桥碑刻静静的矗立着，用无声的语言向人们述说着昔日洪水肆虐的情景。

此碑建于明代，坐南朝北，螭首方座，首身一体，通高 2.9 米，碑首高 1 米，宽 0.97 米，厚 0.4 米，碑身高 1.9 米，宽 0.86 米，厚 0.33 米。额楷书“万古流芳”，碑立于崇祯九年（1636 年）。碑文已经模糊，依稀可以辨识的文字是：“盖闻古人云积金……韩村河迎四方之通渡也……”，落款“大明崇祯九年岁次内午孟夏癸巳月吉辰立。”

韩村河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西有西汉纪信将军墓，有唐开成年间的墓葬，碑刻中有“韩村”字样。其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年以前。

韩村河的历史上被人称为“寒心河”。解放前，韩村河村是一个典型的村破家贫的贫穷农村，饥饿与贫穷氤氲着在这片土地。村内可耕作土地仅占全村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且土地贫瘠，不宜耕作；此外，由于村域地势低平，右邻龙泉河，前临潏流河（俗称牯牛河）。虽然有丰富的水资源，但一到夏季极易遭到暴雨山洪侵袭，轻则水土流失，庄稼冲毁；重则房倒屋塌，百姓流离失所，逃荒要饭。直到改革开放前，全村老少依旧在为温饱发愁。据《房山县志》、《良乡县志》记载，历史上房山西南的韩村河附近水患频发，仅明朝洪武至天启 250 年间严重的水灾就有 14 次之多。仅举几例：

明洪武十年（公元 1377 年）十月北京各州县大水。

永乐十三年（公元 1415 年）六月北京河水泛滥，坏庐舍，没田稼。

正统四年（公元 1439 年）五月顺天府属州县大水成灾。

景泰六年（公元 1455 年）七月顺天府六月以来，天雨连绵，所辖地亩淹没无收。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良乡县大水。

万历五年（公元 1577 年）六月顺天府大雨，浑河水溢，田禾殆绝。

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闰六月大雨，洪水骤发。良乡城俱倾，势若江河，漂尸遍野。清朝至民国年间，水患依然有增无减。牯牛河上桥梁多次冲毁，明朝崇祯年间重修石桥，自在情理之中。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 年 8 月中旬永定河、小清河、牯牛河、琉璃河河水漫溢，决口 9 处。全县 152 村受灾，重灾 30 余村，约 2.6 万亩庄稼绝收。

改革开放以后，昔日的寒心河变成了房山区最富裕的村庄。韩村河公园里的那座石碑经历了岁月沧桑，见证了数百年间的风云变幻，更期待着明天美丽的生活。

## 双磨村的两座重修石桥碑

房山区长沟镇双磨村中有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流，村中南北通道上有一座桥。桥北西侧立有两通石碑，记载了修桥的经过。

东面的石碑立于清代光绪九年（1883年），坐北朝南，方首方座。碑高2.45米，宽0.82米，厚0.28米；碑座距地面高0.17米、宽1.07米、厚0.57米。碑额篆书“万古流芳。”由于风雨剥蚀，碑文已经模糊，依稀可以辨识出以下文字：“厥夫十月成梁，古有定制。盖以土木为桥者也……后面的碑文比较模糊，大意是说，土木为桥的地方多是平原之野，水势平缓，可以涉足，绝非水势凶险之地；而这里“畿辅之地，西接太行，每夏秋之交，山泉涨发，惊湍急流，震荡汹涌”修桥不能仅靠几块木板、土石为之。碑文继续叙述道，这里修桥必须“如卢沟，如拒马那样，云舒虹卧。以石代木，乃地势使然也。”后面的碑文具体说到双磨村修桥始末。“双磨村居房邑西南，接西陵御道，近太行之麓，村之东北南旧有石桥三座，建自清道光十六年……由此可知双磨村最早有记载的石桥修建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距今已经170多年了。碑文着重记述了这次修桥的经过：“……甫经数十年，霖摧浪湍”原来的石桥渐渐损毁，于是：“本乡善士并四方往来诸君子，捐资巨资若干，更新修葺，于癸未岁暮春竣工。从此，波涌浪奔，常倚其中流砥柱。……大清光绪九年四月立。”碑文最后刻有“王怡恺撰文，齐华龄书丹”以及修桥当事人及捐款人刘贵、刘珍等人的姓名。

紧邻光绪年的修桥碑立有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立的修桥碑刻。首刻有“双磨村重修石桥碑记”。碑通高2.5米、宽0.86米、厚0.25米；碑首高0.83米、宽0.9米、厚0.27米。碑文也已经模糊不清，依照能够辨识的文字，可知碑文大意是：自道光十六年修建石桥，至光绪九年重修，此桥已经破败不堪。而“水势泛滥与左右，不分冬夏，岁岁皆然。是故行人外来，泥泞沾濡，共嗟不便。”村人无奈，平垫沙石以方便行走，但每年山洪暴发，冲刷河道，依然难行。于是村人首事（即村干部），共襄义举，募化四方，重修村南之桥。这次重修还将桥址、桥身进行了改动。“桥址南移二丈有奇，增修五孔。两端接砌，砥平四丈。”碑文中还叙述了这次重修还将村南村北两桥同时重修的事情，由于工程浩大，四旬而成，费用靡多，当时所募集的款项出现了亏空“集资一千二百余元，下亏六百余元。”。亏损部分则按地捐筹。

今天，我们从这两块碑文中可以知道，这里水患曾经十分严重，2012年“7.21”特大暴雨，洪水曾经漫过桥栏。我们还可以了解，旧时农村修桥，多是民间自发行为，热心人出面组织，村民自愿捐款，很少有政府出资。

## 北安村的永济桥

南窖乡北安村地处大房山北麓深山区，南窖乡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最高处猫耳山海拔1307米，平均海拔754.9米。四周群山耸立，中间坡缓地平，状

如窖形盆地。北安村就处于这窖形盆地之中。

永济桥位于南窖乡北安村老村中，建于清代光绪年间，南北横跨河道之上，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单孔石拱桥。桥离河面高 4.4 米，拱宽 8 米，桥面宽 4.4 米，东西长 10 米，上有砖砌护墙，可供村里人马车辆通行。桥东侧刻铭文“紫气东来，光绪十八年，月重修”。重修时间为光绪十八年即公元 1892 年，距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在桥边询问年老的村民，他们说，听老辈子人们说，这座桥修建过很多次，每当桥身破损，危及行人安全，村里便有急公好义的热心人出门组织村民集资修桥，但不知道光绪十八年是第几次重修。

如今，历经百年沧桑的古桥依然默默的拱卫着古老的村庄，桥的两端有许多北安村农民世代居住的农家院落，这座古朴的石桥多年来为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便利。古桥西侧的桥拱之上楷书“永济桥”三个大字，这应该是朴实勤劳的北安人祖祖辈辈对这座古桥的赞颂吧。

## 曹章村的东汉陶井

韩村河镇曹章村东赵淑云家的老宅院里有一眼东汉时期的陶井。井壁由灰、红陶加砂，两种陶圈摞成，井圈部分深达 9.9 米。井圈数量共 33 道，每圈高 0.27 米，直径 0.6 米。青砖接井口 0.47 米。井深 10.3 米，水深 2.4 米，水质甘甜。两千年来，它默默奉献，供村民饮用，浇灌园田，直到 80 年代后期，村里使用了自来水才退役。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东汉时期的陶井呢？

众所周知，周口店的龙骨山是中国北方最早的人类生活的遗址，琉璃河的商周遗址是 3000 多年前的燕国都城，是北京最早建城的见证，这已经成为学术界文化界的共识。曹章村北距周口店约 20 公里，东距琉璃河 3 公里，这里有早期人类生活，形成最早的村落，应该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陶井出现在曹章村，并且不是土井，不是砖井，而是陶井呢？

大约 1 万年前，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开始了氏族生活，逐渐出现原始农业，先民不再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曹章村处于周口店西南水草肥美，沃野千里的平原地带。山顶洞人走出龙骨山，在近处形成了房山地区早期的村落。北京文史专家通过对建国以来房山地区地下文物发掘的研究，对照相关史籍资料，认为房山区村落的形成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发轫和初步形成时期在新石器中晚期至秦汉之际。这时的村落不多，稀疏分布在拒马河、大石河之间的扇形冲积平原。曹章村不仅符合这样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而且，近年来附近还有许多发掘的文物为佐证。

1981 年在娄子水村西发现 2 座汉代陶窑址，窑呈圆形，高 2 米、直径 1.8 米，出土大量陶片。

南韩继村西，曾出土战国“明字”刀币约 5 公斤。1986 年 7 月石楼镇石楼粮管所内，出土汉代红陶夹砂陶灶一个，陶面有三个锅，其一只坐带篋子的小罐。1990 年 4 月 12 日阎村镇焦庄村西，出土战国陶壶四件，红、灰夹砂陶鬲各一件。陶壶一件有盖，高 41 厘米，口径 11.2 厘米，壶上有几何纹、鱼纹等。曹章村附近有这么多的村落与陶窑，出现这样的水井也不足为奇了。

七十万年前，著名的“北京人”就在周口店龙骨山一带繁衍生息。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建立之初，周武王分封召公奭于燕，在今琉璃河地区置燕都城。战国时期，燕国置中都县，县治位于今窦店西里许。窦店距离曹章村 10 公里左右；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于燕地置广阳郡（今长阳镇），辖蓟、良乡（中都县改良乡县）。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置广阳县，隶燕国。置良乡、西乡侯国，并隶涿郡。西乡县治所在今天的长沟镇，距离曹章村不过咫尺之遥。西汉西乡更名“移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废西乡侯国，并入涿。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复置西乡侯国。查阅历史资料可以知晓，曹章村自商周之后至秦汉，行政上始终归属西乡。千百年间，经济不断发展，人烟逐渐繁茂。因此，这里出现东汉时期的陶井不足为奇。令人深思的是，陶井历经千年风雨，没有塌毁，没有损坏，依然水量丰沛，依然可供乡亲们饮用。这至少说明，这里地表水很浅，陶井仅 10 余米深。两千年来，地表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与沉降。

### 灵鹫禅寺的三眼井

北车营村北的谷积山历史悠久，谷积山院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就是佛教圣地。谷积山院在北车营村西北部的群山怀抱中，四面山峰连绵起伏形如谷堆，故此得名谷积山。谷积山寺院在辽代以前就香火鼎盛，这是一组较完整的古建筑群。包括灵鹫禅寺、圆通殿、古塔、碑刻等，到元代改称谷积山华严禅寺，明朝正统年间重修后改称灵鹫禅寺，当年为佛教圣地，如今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正殿后檐墙的辽代大康四年（1078 年）镌刻碑和元朝至正七年（1347 年）镌刻碑以及前殿明朝正统五年（1440 年）立“敕赐灵鹫禅寺”碑记述了灵鹫禅寺的发展历史。

禅寺东门相对的山上，曾经有一座两层楼的钟鼓楼。钟早已不复存在，钟鼓楼保存完好。钟声是僧人的每天起居饮食的主要讯号。据说，香火繁盛时，钟声远播十里以外。钟鼓楼以西，山院东墙外的地里，一块平坦的岩石上有一口井，井口直径约一米半，井深约 20 余米，井旁破损的石桩说明它的历史久远。此井是从巨石上凿下去的，凿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据村民讲，在井旁辘轳下面的井壁上，砌有一块小石碑，碑上刻有“庙塌山门在，门倒井必枯，井枯必淘井，淘井庙重修”的字样，因此，井水于大旱之年都没干枯过，尽管它经过多次劫难，寺庙也一直没有倒塌。

灵鹫禅寺后面的谷积山上，有三座塔。西侧山梁上的铃铛塔，为灰色；中

间的是鞭塔，东面的塔俗称和尚塔，位于东侧山峰之上。塔为白色，也叫浮图塔，砖瓦结构，近四米高，塔基为莲花瓣状，塔身呈覆钵式，四面各有一龕，内组雕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双层须弥座呈“亚”字形。

西面山峰上的铃铛塔建于明代。八角形九层楼阁空心式。全部采用汉白玉石砌成。选石精良，造型美观大方。塔顶各角系有铜铃，只要有微风拂动，便有悠扬清脆的铃声在峡谷中回荡。塔身里每层内有回廊。可从一层台级上到塔的顶层。站在塔顶之上，可以俯瞰谷积山的全部秀丽风貌。这种型制塔在房山区仅有一座。该塔建于明万历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根据《大元敕赐灵寺碑》记载应是元至正七年“高丽僧天湛大师”的墓塔。西面铃铛塔附近还有两眼井，水井何时开凿，已经不可考。令人称奇的是，西山峰比北车营村大街海拔高出 200 多米，这两眼井经历了岁月沧桑，今天依然能够供人们饮用。

这深山古寺中为什么会有三眼井呢？仔细研究，谷积山院的辽碑道破天机。辽碑碑额篆书：“大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文记载了辽代( 916---1125 年 )良乡县南吕村张文绚及妻田张氏之在此处读经的缘起经过。碑阴首楷书：“师德华严七处九会千人邑碑。”什么是“七处九会千人邑”？

碑文说明，早在公元 1078 年，这里的佛教寺院，规模弘大，名噪京华；碑阴文字说明这里曾经举行过多次千人邑会。“千人邑”是佛教语言。早在北魏时期，就有一种叫作“邑义”的佛教基层组织，与辽代的“千人邑”很相似。现存房山云居寺的《重修云居寺千人邑会之碑》首记其事。此碑立于辽应历十五年（ 965 年），碑阳刻“邑人”王正撰写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碑阴刻千人邑邑首及邑众的题名。碑记称寺主谦讽“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先例，纳有常斯，贮于库司，补兹寺缺。”这是目前所见金石文献中对“邑会”的组织形式、意旨、入会条件、捐施定例的最直接的记述。

辽朝崇佛之风最盛，而其陪都南京（今北京）地区尤甚。随着佛教信徒的日益增多，燕京地区出现了许多佛教邑会组织，通称为“千人邑”。这种邑社多由寺院僧人或乡、村头面人物组织成立，虽称“千人邑”，其实邑众也许不足千人。

辽代中晚期，较大的邑会组织经常组织佛事活动。辽碑记载这里“四面之峰峦掩映，幅员数里，昼夜六时，徒侣精勤”，这说明早在辽代，这里已经是香火兴盛，聚居了许多村民。那么，深山古寺中出现三眼井也在情理之中了。

顾梦红：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